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辨析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 叶柏川

1618年,俄国佩特林使团来华,拉开了早期中俄关系的序幕。从1618年到鸦片战争之前,先后有大小十几个俄国使团来华。这些使团皆被冠以寻求中俄通好之名,但从使团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使臣身份的多重性等方面来看,使团的使命远非如此单纯。本文拟对早期俄国来华使团的人员构成做些研究,并从这一角度探讨早期俄国来华使团的真实使命以及俄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

一、早期俄国来华使团的人员构成

早期来华俄国使团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千人。使团最初仅由几名哥萨克、布哈拉商人和少数军役人员组成,后来发展成为包括使臣、商队、军人、传教士、留学生、测量专家、书吏、通译、医生等各种人员组成的庞大团队。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中除了外交使臣外,其他人员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1. 商人是俄国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中有相当数量的商人。俄国沙皇派遣使团来

华的初衷是为了调查中俄贸易的情况。第一位正式的俄国来华使臣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便是沙皇的代理商。此人为托博尔斯克大贵族伊萨科夫之子,虽是个文盲,却非常善于理财。1653年,他被派往当时西伯利亚的商业中心城市托博尔斯克,安排有关沙皇的通商事宜。当时,在托博尔斯克云集了中亚商人运来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商品。巴伊科夫奉命了解在中俄市场上畅销的两国商品以及关于清朝的情况。他在北京成功地进行了贸易,并开辟了从西伯利亚前往北京的商路。

布哈拉商人是俄国使团中非常活跃的一股力量。他们既精于算计又熟悉中亚及西伯利亚一带的地形,常被俄国人派作向导、信使或代理商。俄国人希望利用他们的经验去和清朝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1652年11月23日,根据沙皇阿列克谢的谕旨,布哈拉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叶日巴勃·谢伊托夫被召到莫斯科。这两个人是以同中国做生意而出名的中亚商人。谢依特库尔·阿勃林更是具备布哈拉人的一切优点,是为俄国政府效劳的布哈拉商人的代表。不久,他被派往托博尔斯克协同巴伊科夫出使中国。1658年,他作为使臣与佩尔菲利耶夫率队前往中国替沙皇经商。1668年,他再次带队前往北京。在历届俄国来华使团中活跃着不少像阿勃林这样的布哈拉商人。据《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记载,1668年,有200名布哈拉商人随同阿勃林前往中国经商。^①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终于取得了其对华贸易权利在外交上的承认。此后,商人更加成为使团最为醒目的组成部分,商队人数有时竟达七八百人以上,这些商人常常打着出使的旗号来华贸易。

俄国使臣萨瓦在给宫廷的报告中谈到:“根据北京档案记载,签订《涅尔琴斯克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俄方曾派50多名使臣和使节去北京。而外交委员会派赴中国的正式使团不过4个……其余的都是各边境长官和行政长官为了进行贸易和满足他们的个人愿望从西伯利亚派去北京的,并且在他们发出的信函中把派去的人称为使臣和使者……”^②刘选民在《早期中俄贸易考》一文中也提到过这样的例子:“17世纪末叶,俄廷遣发之使者,多阳为外交使臣,阴附通商使命,并时携有商队至北京贸易;或以商贾而委以外交折冲事宜,其例屡见不鲜。例如在《尼布楚条约》后,果罗文即于是年十月遣

使至北京报信,谓额尔古纳河他岸之俄国人民,须候明春方能遣返俄境。该使于1690年5月25日抵北京。张诚记之曰:‘俄使携有随员八十九人,自其外貌观之,任何人等皆得断定彼等之来仅为通商而已,盖其携有毛皮六十大车也’。”^③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被派遣的商队常常与从尼布楚前往中国的俄国外交代表同时启程。1693年7月,俄国使臣伊兹勃兰特从尼布楚动身时,“有一支全新的几乎全部由客商代理人组成的人数众多的商队随同其前往北京”^④。

18世纪中叶,随着北京贸易衰落,已不再有正式商队随同使团来京贸易。

2. 传教士和留学生是俄国使团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强在华的东正教教徒的联系,俄国政府不断派遣东正教教士随同使团和商队来华。伊兹玛伊洛夫使团中的修士大司祭安东尼和萨瓦使团中的英诺森主教都曾被任命为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关于英诺森主教为传教士团团长的任命后来被取消)。驻华传教士团直接参与了中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尽管来华传教士团曾一度为俄国侵华尽心竭力,但他们的确在中俄外交往来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3. 俄国使团中的军役人员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有数量不等的军人跟随:佩特林使团中有军役人员7人,巴伊科夫使团中有军役人员5人,阿勃林使团中有军役人员26人,斯帕法里使团中有军役人员46人,戈洛文使团中有军役人员1923人,伊兹勃兰特使团中有军役人员90人,伊兹玛伊洛夫使团中有军役人员5名(包括使臣),萨瓦使团中共有士兵1500人。

可见,只有戈洛文使团和萨瓦使团的随行军役人员较多,其他使团只有少量军役人员跟随,而且这些军役人员大都是哥萨克,正规士兵很少。究其原因:一方面,俄国的主要兵力集中于西方战场,没有能力派出强大的军队以威镊清政府;另一方面,当时俄国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华贸易缓解国库空虚、经济凋敝的状况,因此,它并不希望同清朝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只想暂时通过和平手段与清朝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除戈洛文使团和萨瓦使团所带军队是为了向清政

府示威,其他使团有军人随行都是为了保护使团的安全起见。

4. 俄国使团中的测量人员

使团中的测量人员受命绘制两国即将划界地区的详细地图。伊兹玛伊洛夫使团中有科学院测量员西奥多尔·巴尔聂夫和米契尔·伊格纳季耶夫随行。萨瓦使团来华谈判时,俄国政府专门派遣斯科雷乔夫和弗拉索夫为界务官,负责划界事宜。他们的助手斯捷潘·阔留赤甫是地理勘测专家,此人刚刚参加过俄国与波兰、土耳其的划界事宜,经验非常丰富。此外,使团中还有3名测量人员,阿列克谢·库列绍夫、米哈伊洛·齐诺维耶夫、伊万·瓦卢耶夫。在萨瓦出发之前,俄国政府已经命令西伯利亚总督派人绘制两国即将划界地区的详细地图。萨瓦到达伊尔库茨克后,又重新组织人员进行测绘。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实力雄厚的测量队伍,在恰克图谈判之前,俄国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份完整的中俄交界地带的地图,而清政府却对这片土地认识极其模糊,使俄国在划界谈判中获得了许多土地。曾参加中俄划界的俄国工作人员向政府表功说:《恰克图条约》所划边界“较之过去俄罗斯居民所占有的土地有大量增加,而且还从蒙古领地中将许多从未归俄国所有的土地划进了俄国版图”^⑤。使团中测量人员的工作还为俄国在未来向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做了前期准备。

二、早期俄国来华使臣的级别与身份

使臣是使团的核心与灵魂。早期来华俄国使团中,使臣的级别不断变化,其身份也相对复杂。另外,这些使臣中还有不少外国人。

1. 使臣级别的变化

在俄国,使臣分为大使、公使和急使。使臣的级别决定使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俄罗斯国家,同时也体现出在某一时期俄国政府对使臣所出使国家与俄国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

最初派往中国的使臣巴伊科夫等人充其量是急使。17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注重对中俄关系的经营,来华俄国使臣级别逐渐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俄国愈发认识

到对华贸易将给其带来不可估量的财政收入,希望通过外交努力取得来华贸易的权利;另一方面,随着中俄边界冲突的升级,清朝政府强烈要求划定两国边界,这使俄国政府不得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俄国,使臣级别的确定“不是根据某一等级的实际意义,而是根据使节随员的多寡”^⑥,当然,起作用的还有君主赐予的头衔和使节所担负的使命等因素。戈洛文被沙皇任命为俄方尼布楚谈判的全权大使,因此该使团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使团。使团包括各类军役人员和工作人员,总共人数有2 000余人。仅西伯利亚衙门拨给各类军役人员的薪饷就达31 000卢布,此外,还拨出2 000卢布作为使团在达斡尔地区雇佣车马的费用。沙皇又另赐给戈洛文大使2 000卢布的薪俸。^⑦关于第二、第三等使臣级别的确定,《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谈到:“如果外交事务衙门在确定派往国外的大使或公使的地位时,决定性的根据是经济上的考虑,那么在确定第二等和第三等(公使或急使)之间的差别时,最正确的做法是以直接代表的数量、国家给予外交代表的权利或信任为基础。虽然伊杰斯是自费旅行,随员很少,所带礼品微薄,但他是由君主直接派往他国,并携带‘亲善国书’,因此他仍属于第二等外交官。”^⑧

19世纪中叶以前,共有戈洛文和萨瓦两位大使来到中国,他们分别代表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规范了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近2个世纪的中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意义重大。斯帕法里曾被授权在必要时可自称大使。^⑨大使以下是公使,也称专使,如斯帕法里、伊兹勃兰特、戈洛夫金等人。公使之下是急使,如米洛瓦诺夫、普洛特尼科夫等人。还有一些使臣作为外交代办,他们没有任何等级,其中包括轻骑信使和商人,如郎克曾于1719—1721年出任俄国驻华的外交代办,这是“外交、贸易和领事”的兼职。^⑩随同巴伊科夫出使时,阿勃林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信使。

2. 使臣身份的多重性

使团中使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多重身份,肩负多种使命。在当时的俄国,大使、军人和商人没有严格的区分。大多数使臣首先是商人,他们来华与其说是为了完成外交使命,不如说是为了贸易。正如加恩所说,早期来华的使臣“既是商人,又是外交代表。俄国的

中央政府和这些代表本人,也难以分清这两种职务的性质和作用,携带政府文书的使者从事贸易,或者由商人做伴一同前来,而给予商务代理人的使命也常与他们的正业无关”^①。

除了上文提到的巴伊科夫和阿勃林外,斯帕法里、伊兹勃兰特·伊杰斯和伊兹玛伊洛夫出使中国都带有贸易的性质。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记载了斯帕法里在华贸易事:“康熙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赖(斯帕法里)等至,圣主仁皇帝召见之,赐察罕汗书,谕边界事,是其国通贡之使,即已兼携方物贸易,是以尼果赖一人或称陪臣或称商人也。”^②伊兹勃兰特·伊杰斯是受彼得一世所派作为官方代表到北京调查中国市场的经济情况的。伊兹勃兰特本是荷尔斯泰因商人,他在出使中国前已经是债台高筑。为振兴业已衰败的事业,他争取到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希望通过此行能够牟取暴利偿还债务。此外,伊兹玛伊洛夫也是以专使和官商的身份出使中国的。

3. 有相当一部分使臣是外国人

早期来华的俄国使臣中,斯帕法里是摩尔达维亚人,伊兹勃兰特是荷兰人,萨瓦是希腊人,等等。那么,作为俄国使臣出使中国的外国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俄国?

在莫斯科国时代,国籍的归属没有法律意义,国家的文书中找不到保存办理归属俄国国籍手续的奏章或谕旨。在当时,取得贵族身份、担任公职、获得某种称号,都可起到文书的这种作用。被录用担任军职的外国人都要宣誓效忠,“立誓忠诚服务,守正不阿、求上帝及其神圣福音保佑我求得永生,求得永生”^③。茨维塔耶夫在《尼古拉·巴乌曼将军及其事业》、《17世纪外侨区生活见闻》中谈到:“在莫斯科人的概念中,俄国臣民即是东正教教徒,成为俄国臣民就意味着受洗礼信仰东正教。在莫斯科国家领土上出生的外国人的子女,没有加入东正教之前仍然是外国人,其出生地点没有任何意义。”^④可见,归属俄国教会就等于归属俄国,等于承认新受洗礼者及其后代永远成为俄国人和俄国的一部分。斯帕法里是个狂热的东正教徒,他自然被俄罗斯人完全接受。

况且,根据当时欧洲的外交惯例,任用外国人完成外交使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伊兹勃兰特既不是俄国人,也不信仰东正教,同样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类似情况十分常见,

如:德国人阿尔伯特·冯·德尔·利特从1705年起任彼得大帝驻柏林的俄国宫廷专员和代理人,1706年至1707年任特派公使^⑮;意大利人弗洛里奥·贝涅维尼在1718年作为俄国公使被派往布哈拉^⑯;荷兰商人托马斯·克列尔曼在1668年作为大使被派往匈牙利,主要商谈共同打击土耳其人的问题^⑰。另外,在普鲁士同样“很少注意最初的常驻外交代表是否为普鲁士人,只是不向外国宫廷派遣具有该国国籍的人……直至1746年普鲁士才颁布命令,只有普鲁士人才能充任使节”^⑱。

三、早期俄国来华使臣人员素质 与其所完成的使命

中俄两国在17世纪中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在后来的20年内,两国关系始终没有显著进展。直到17世纪末,中俄才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此后又于1728年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是接下来近2个世纪的中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运作的框架。特别是后者,被称为是俄国在外交和商业上的重大胜利。通过《恰克图条约》,俄国几乎实现了它从前对中国的“一切相类似的企图”^⑲。中俄关系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与俄国来华使节级别及素质的提高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讲,使臣的素质是使臣能否完成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最初主要是依靠地方力量进行的,而最早来华的俄国使臣就是这些未开发地区的拓荒者,他们大多目不识丁,更谈不上懂得外交权术。对这些人来说,逐字逐句地遵守沙皇的谕令才是最保险的。如巴伊科夫、阿勃林、佩尔菲利耶夫等人就是这样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因“礼仪之争”而陷入僵局是很自然的。

随着对华政策的调整,俄国政府开始派遣具有外交才能和熟知清朝事务的人出使中国,中俄双方开始实现真正的对话。从斯帕法里开始,俄国使节的级别及素质明显提高。斯帕法里曾被莫斯科外交事务衙门委任为使节事务部希腊、拉丁等几种语言的首席翻译^⑳,班蒂什-卡缅斯基称他是“一位富有经验而又敏慧的人,他精通希腊

文、拉丁文、摩尔达维亚文和俄文”^{②①}。斯帕法里于1675年被任命为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派往中国的使团团长。政府授予他的官衔是使臣,但命他必要时可以自称大使。为此,外务衙门交给他两封不同衔称但内容相同的国书。斯帕法里在礼仪问题上与清朝官员发生争执,同样没有完成使命。但他与在其之前出使中国的使臣毕竟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渊博,并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因此他的中国之行的收获要远远大于以往使臣。

值得一提的是,斯帕法里凭借他的才学赢得了耶稣会教士南怀仁的友谊,这是俄国使臣首次与耶稣会教士建立联系。南怀仁毫无保留地向他通报了清朝政府对俄国使团的看法、对根次木尔事件的态度以及清朝国内的战乱局势等等。事实证明,耶稣会教士在以后的中俄交往中对俄国的帮助巨大,这一点在恰克图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在发展同耶稣会教士的关系上,斯帕法里自然功不可没。

斯帕法里中国之行的另一重大成果是他回国后写成的2部著作:《出使报告》和《中华帝国志》。《俄国·蒙古·中国》一书的作者巴德利在将斯帕法里和在他之前来华的俄国使臣的使华日记加以比较时谈到:“这些记述(斯帕法里的除外)论文体都是质朴甚至是粗鄙的,论内容是平凡乏味的。它们没有任何探讨与分析,缺乏引人入胜的魅力,又毫无传奇的色彩……惟独斯帕法里属于例外。他的地位和声望是(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在从事同一职业的人们中间,再难以找到比这位瓦拉几亚地方博学的希腊人,与在他以前从托博尔斯克出使北京的哥萨克文盲之间更为悬殊的差别了。斯帕法里信奉希腊正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俄国人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就很少有相同之处了。斯帕法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仅在出使中国的前四年,才首次踏上俄国的国土;在当时的博识人士中间,他不仅数得上,而且是出类拔萃的。斯帕法里在北京遇见南怀仁时,曾同他用拉丁语交谈,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学问不相上下;而巴伊科夫在中国碰到汤若望和荷兰使团的人员时,由于语言不通,就无法与他们交谈。”^{②②}以上评价足以说明斯帕法里《出使报告》的价值。

除《出使报告》外,斯帕法里还编写了一本关于清朝疆界、宗教、山川河流、社会风俗、行政区划、周边国家等情况的著作——《中华帝国志》。班蒂什-卡缅斯基在《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6—1792)》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部著作:“在撰写这部著作时斯帕法里

除了利用他在旅途中的见闻和打听到的素材外,还利用了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口述的材料和他们用欧洲文字出版的著作……如果不将那些专使和商人从中国携回俄国的短篇札记和口头传说计算在内,斯帕法里的这本书应该认为是俄国第一部详细记述中国的著作。”班蒂什-卡缅斯基认为:“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本书同那些与斯帕法里同时代的耶稣会教士以及欧洲旅行家所写的同类著作相比,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远为重大得多的意义。因为在斯帕法里的这部著作中,对于和俄国接壤的中国各地区以及通向中国的各条陆路都作了较多的记述。”^②

正是由于斯帕法里向俄国政府提供了如此详实的资料,俄国政府才对清朝有了全面的认识,开始调整观念,不再将其与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进程中遇到的小汗国相提并论,而将其作为与俄国同样强大的国家来对待。

在斯帕法里以后来华的俄国使臣都具有一定的级别和才华。他们在中俄谈判中为俄国争取了重大的利益。

尼布楚谈判俄方首席代表戈洛文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大使,在出使中国之前任御前大臣兼布良斯克总督。其父阿·斯·戈洛文曾任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将军。戈洛文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数种语言。他精通拉丁语,在尼布楚谈判时能够用拉丁语向参加谈判的耶稣会教士讲演。

虽然率团出使中国是戈洛文第一次担任外交使命,但他在这次出使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1687年,他率兵猛烈攻打贝加尔湖地区的喀尔喀蒙古。尽管俄国国内有声音谴责他在贝加尔湖地区耽搁过久,延误了谈判,但事实证明,他采取的军事行动给清政府造成了压力,促使清政府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同意将俄国梦寐以求的贸易条款写进条约。《尼布楚条约》被认为是“俄国的一个重大胜利”^③。戈洛文回国后被授予贵族爵位并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后来,他负责使节部的工作,领导驻波兰、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俄国大使的工作,他还参加了同土耳其缔结和约的工作。

1720年来华的伊兹玛伊洛夫曾奉彼得大帝之命在丹麦军中服役,升为上尉,回到俄国后被任命为近卫军普雷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上尉军官,1710年又奉命到丹麦去担任一项外交使命。正因为他具有军人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才被派到中国去。^④

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成员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劳伦茨·郎格。此人是18世纪中俄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熟悉清朝事务的专家。他自1715年首次来京历经20余年,几乎参与了18世纪前半期的全部中俄交涉活动。郎格在北京同耶稣会教士有过接触,尤其与巴多明神甫熟识。从那时起,他的才干越来越受到俄国政府的赏识。他具有关于商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远东的风土人情,还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因此不断被俄国政府委以重任。他同伊兹玛伊洛夫和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一起留在北京近2年(1720年11月29日—1722年7月),曾任俄国驻华商务代表。以后,他就留在西伯利亚负责中俄之间的交涉。1724年,俄国政府为了便于郎格行使职权,授命他统领边境地区的俄国马、步兵200人,并可直接与西伯利亚总督通函,不必诸事呈请政府,以便节省时间。1725年,郎格由于熟悉清朝事务而被俄国政府任命为大使萨瓦的助手,前往边境谈判。萨瓦对郎格赞赏有加,称郎格“不仅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对国家事务非常用心,他和中国人来往和对边境事务都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生活在边境上已经有十多年”^②。《恰克图条约》签订后,郎格多次任来华商队总管,负责对来华商队及传教士团的管理工作,后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副总督,就职伊尔库次克。

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二位全权大使。此人非常善于应付复杂微妙的商业谈判和外交事务。他不论是处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处理琐碎的日常事务,都异常有条理、清楚、精确。加恩曾这样称赞他:“俄国在它的对华谈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这样有才智,这样称职以及对俄国利益这样忠诚的人物。”^③

萨瓦行前接到了外交事务衙门和商务委员会发给他的70几条训令,他对每一条训令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对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并向以上两个部门提交了包括35个问题的报告。在恰克图谈判中,萨瓦施展其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俄国争取了巨大的利益。加恩评价萨瓦使团取得的成绩时说:“从中俄建立关系直到今天(20世纪初),在两国所有的外交使节往来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使团最为盛大,也最为重要。经过2个世纪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变迁,那时缔结的条约大部分条款仍然有效。这次出使使俄国的外交和商业获得了永久性的结果,对科学和文化方面同样如此。”^④萨瓦回国后,因谈判有功,被俄国政府任命为枢密

院顾问并被授予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骑士勋章。

萨瓦还堪称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1731年,他向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递交了题为《关于中国的实力和情况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他陈述了全部或部分征服中国的可能性,建议“不要在尚未做好极其充分准备之前因小事而与中国及其属民打仗,以免开支过大使西伯利亚边民非常需要的贸易遭到中断”。他还详细说明了“和平时期应如何在边境筹备和增加人员、现金、军粮、枪炮及其它军需品以供将来之用,以及届时用什么方式向中国宣战为宜”等。^②沙皇政府立刻采纳了他的意见。萨瓦还写了关于对华贸易的报告,他的一些思想成为俄国政府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依据。

总之,可以毫不怀疑的说,早期俄国来华使臣为俄国取得对华的政治经济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使臣身份的多重性及其在华所完成的使命表明,这些使团负有政治和商业双重使命。这一时期,为了支持在西方的连年作战和缓解国内的经济状况,寻求在华的商业利益是俄国追逐的最主要的目标,但它也没有放弃对土地的争夺。早期俄国来华使臣素质和级别的变化也体现了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所倚重力量的变化和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注释】

①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1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29—430页。

②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刘远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第25期,第161—162页。

④班蒂什-卡缅斯基:《17—18世纪俄国原始积累问题论文集》俄文版,第426—427页。

⑤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387页。

⑥M.卡普斯京:《17世纪后半期俄国与西欧的外交关系》,莫斯科1852年俄文版,第51页。

⑦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71页。

⑧伊杰斯:《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

版,第39页。

⑨M.卡普斯京:《17世纪后半期俄国与西欧的外交关系》,莫斯科1852年俄文版,第51页。

⑩伊杰斯:《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中译本,第40页。

⑪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页。

⑫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第1页。

⑬伊杰斯:《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译本,第39页。

⑭茨维塔耶夫:《尼古拉·巴乌曼将军及其事业》,《17世纪外侨区生活见闻》,莫斯科1884年版,第7页。引自《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译本序言。

⑮克劳斯克:《15世纪到1815年和1818年末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发展》,第45页。引自《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译本序言。

⑯B.盖埃:《莱布尼茨与彼得大帝的交往》,第355页。引自《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译本序言。

⑰布吕克纳:《17世纪俄国外交官》,载《俄罗斯评论》,XXVIII(彼得堡)1888年版,第33—72页。引自《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译本序言。

⑱J.克鲁舍:《从勃兰登堡—普鲁士派往沙皇宫廷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产生和发展直至俄国进入欧洲大国行列》,第182页—183页。引自《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译本序言。

⑲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195页。

⑳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62页。

㉑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40页。

㉒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中译本,第19—22页。

㉓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518页。

㉔《苏联历史纲要·封建主义时期·18世纪初叶的俄国》,莫斯科1954年版。

㉕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153页。

㉖同上,第339页。

㉗同上,第199页。

㉘同上,第195页。

㉙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394—395页。